



华中学术文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论文选萃（2005-2012）

黄永林 主编

· 文学研究卷 ·



华中 文学 学术 存中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论文选萃(2005-2012)

文学研究卷

主 编 / 黄永林
副主编 / 王泽龙
吴敬东
邓宏炎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学术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论文选萃
(2005—2012) 文学研究卷/黄永林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22-6208-4

I. ①华… II. ①黄…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③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5937 号

华中学术文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论文选萃(2005—2012)(文学研究卷)

黄永林◎主编

责任编辑:王雪松 刘晓嘉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字数:4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定价:112.00 元

责任校对:王 胜

电话:027-67867364

封面设计:罗明波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31

印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陕西校友会会长、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总裁吴一坚先生,陕西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德安先生及陕西校友会全体校友资助出版。



编委会

主任:马 敏 杨宗凯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卫金磊 马 敏 王泽龙 邓宏炎 杨宗凯
吴敬东 范 军 周 彦 段 维 黄永林

前 言

华中师范大学迎来了 110 周年华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5 年创刊,已走过近 60 年历程(是新中国最早创刊的几家学报之一)。华中人文学术历史久远,成就辉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这一学术平台伴随着华师的成长与发展,较集中地展现了历代华师学人的学术成果,汇集了华师人文社科类学科大量的学术精品。为了迎接华中师范大学 110 周年华诞,我们组织编辑了这一套《华中学术文存》。在 2005 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刊庆 50 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过学报论文集(电子版)。这一套《华中学术文存》汇集的是 2005 年以来,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我校专家学者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几年的学术成就,反映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学术影响。

借此 110 周年校庆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发展办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谋划了这一套文存的出版,旨在传承华中学术薪火,光大华大人文传统。文存按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教育研究分编成册,每一编按照专题分类,以便阅读。衷心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陕西校友会资助出版。

《华中学术文存》编委会
2013 年 6 月 10 日

目 录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 温儒敏(3)

“视界融合”中的生命之流

——中国 20 世纪新文学现代品格的动态考察 黄曼君(23)

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

——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 解志熙(43)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樊 星(79)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思想方式批判 高 玉(92)

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

——论郭小川 1957 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 夏中义(107)

论中国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 王泽龙(130)

西川的诗:从“纯于一”到“杂于一” 陈 超(147)

《尝试集》的问世与再版 陈方竞(169)

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 叶嘉莹(187)

释“诗可以兴”

——论诗性生命的感发功能 陈伯海(214)

《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佩饰意象 李炳海(231)

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视角转换 王齐洲(245)

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王先霭(265)

论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	黄念然(273)
----------------------	----------

三、文艺理论研究

文艺理论 30 年:成就、格局与问题	钱中文(293)
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	陆贵山(304)
民俗学的当代性建构	黄永林 韩成艳(320)
开放的民族主义 ——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	胡亚敏(341)
批评的历史维度 [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胡亚敏 李恒田 译	(350)
文学中的后现代伦理:晚期德里达、莫里森及其他 [美]希利斯·米勒 何卫华 译 胡亚敏 校	(368)
回顾与反思 ——文艺美学 30 年	曾繁仁(384)
西方语境下的中国美学发展	张玉能(391)
喜剧美学:从“表象自由”到“人性自由” ——由康德到席勒的理论推进	修 倜(407)

四、语言研究

“广数”论略	邢福义(425)
语言也是“硬实力”	李宇明(434)
词缀少但语缀多 ——汉语语法特点的重新概括	徐 杰(444)
从轻动词角度看现代汉语离合词	汪国胜 王 俊(457)
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	储泽祥(469)
新兴的“被 X”词族探微	刘 云(480)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 “价值尺度”问题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

温儒敏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告别了以往的“峻急”，越来越步入“常规化”、“学院化”。这个不再年轻的学科已经有相对稳定的核心问题，积累了多样的研究模式和理路，形成了自身的学科品质和传统。现代文学研究不再甘心为现实功利所左右，也不情愿再充当形形色色理论方法的实验场，它成熟了。新人的不断加入总会呈现某些新貌，但看不到特别明显的“热点”和“潮流”，总的态势是平稳的。

不过细加体察，发现这“平稳”的海平面下，隐藏着某些困扰与迷惑的湍流，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着一一些共同的难于逾越的难题，也孕育着新的变化。

一、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历史，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与现实保持着血肉的关联。在政治化的年代里，这种研究所以能成为“显学”，它的动力来自现实的召唤。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每一波浪潮的掀起，都总是拍打着现代文学的堤岸，催迫文学史家不断去追溯历史原点，梳理解析百年来的“革命传统”，为共和国的“修史”做注脚。这种历史的设定，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现今的情况大变，人们告

别了革命，也告别了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归学术“正途”。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这种躲避现实风云回归学术的渴求是这样普遍。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命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呼唤“学术规范”，其实都是这种焦灼渴望的结果。

现在我们又遭遇另一种“结果”：呼唤“回归学术”的回声尚未消歇，学者们又陷入另一尴尬。市场化这个“幽灵”在中国游荡，毫无疑问它已经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新机，也给学术界包括人文学界带来了某些新动力，但是原先想象不到的巨大压力也结伴而来。拜金主义的流行，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以及浮躁的学风，学界中人都无不感同身受。和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的物质条件已大有改善，所处的学术生态却失衡了，从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

更让人忧虑的，还有学科碰到的一些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难题。近几年社会上和文化学术界许多大的“潮动”，都在向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声质询：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偏狭”，等等。所有这些质疑都由来已久，而这几年因社会历史观的解构、松动与“平面化”，重新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对“新传统”是蔑视抑或维护，其异见日趋对立。虽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进入学术领域，而只以社会言论的方式存在于媒体、网络等空间，但由此形成的流行价值观却影响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文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学定位、“边界”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困扰。

面对这种情势，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

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不那么明显（其实也应当是有的），现代文学则是“本性”要求。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面对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以及这个研究领域如何保持活力的问题。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离不开对当下的“发言”，也离不开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

学者们越来越强烈希望能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

2007年前后，王富仁先后发表《“新国学”论纲》、《“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文，阐述他希望将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纳入“国学”范畴，构建一种“新国学”的设想^①。这显然是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谓“国学热”，顺便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寻找新路。“新国学”概念的提出只在圈子里引发了一些讨论^②。其实，是否有必要采用“新国学”这样一个争议性的名称暂且不论，同行们真正关心的是在传统建构中，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将被置于何种位置，特别是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小传统”与整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关，我这几年提出梳理现代文学“新传统”的思路，同样也是为了回应现实的挑战。我和友人合作写了《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这本书，特别提出：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下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参与价值重建^③。

现代文学所构成的“新传统”虽然不像古代文学的“大传统”那样深厚、稳定，但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并且发挥着切实的规范性影响。那些无视或轻视现代文学传统的人们，容易把传统看

成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他们确定传统时只用一把尺子，量来量去都找不到完全符合的，于是就产生虚无主义，拒绝并走出历史。其实，传统是由历史酝酿的。过去发生的无数大小事物，共同构成了历史，后人是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现场去接触历史本身的，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去想象和建构历史。所以，作为历史产儿的传统，也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叙述’来想象、提炼与建构。不过这是活着的历史，它对我们的生活仍然发挥着规范和支配的作用。现代文学传统不是完整的、固定的、同质性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要看到它延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传统，力图寻找它的‘变体链’，包括它的形成、生长、传播，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选择、阐释、提炼、释放、发挥、塑造，等等”^④。

在当代中国面临价值、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反思、选择、整合各种不同的传统资源，以构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新传统，必将成为这一转折期最迫切的文化问题。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节骨眼上，我们面临“价值危机”，到底应在什么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研究者如何有效参与到价值重建的进程中？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求这些严峻的问题。

所幸我们已经看到了学者们一些努力的结果。

2009年前后，围绕“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对“五四”历史与价值的再书写、再检讨就再次成为学术焦点。这其实也是通过“新传统”的体认来回应现实问题。种种“关于‘五四’的书写”呈现多元的形态，既有相当扎实的“返回历史现场”式的历史考察，也有力图超越“五四”、将“五四”相对化的叙史方式，同时还有站在文化政治的立场上重新解释“五四”作为“现代”起点意义的尝试。像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就力图暂时“搁置”价值评判，而将“五四”所涵盖的历史、文化进程作为客观研究对象加以细密的考察，提倡一种“触摸历史”的态度——“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思想”^⑤。在“五四”日益成为一个价值争论焦点和符号时，把一时说不尽也说不清的抽象判断暂时放入括号，从一系列个案入手，

于细节中观察历史的真实状态和脉络，其实是对各种抽象化甚至玄虚化讨论的反拨，体现出专业研究的优势。当然，这种中立的姿态与略显琐碎的史事追寻，也多少透露出面对大历史的某种迷惑、游弋与无奈。

而另一些学者则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他们认为，对“五四”这样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理解，不是单靠历史事实材料的累积就可以自然达成的，需要一种有明确的认识立场并可供阐释的理论，能明快地把复杂的史事穿透，并有效地“拎”起来。如汪晖、张旭东都并不回避似乎已经腻味了的政治性分析立场，他们提出理解“五四”需要重新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①。在他们看来，“五四”的开端性意义正体现在以拒绝、悬置原有政治为前提，而在文化运动中创造出对新的政治的想象：“‘文化’不是一个抽象问题，文化是重新确认政治，介入政治，与政治相互渗透，并创造出新的政治问题、提出新的政治价值的方式。”^②新文化运动、新文学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革命政治保持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政治宰制文化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形态的历史性展开方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发的新文学、新文化的政治蕴含，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政治形态的表述。

这个看法值得深思。多年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新文学价值观在一轮又一轮观念“解放”的冲击下，变得面目越来越模糊，几乎不可索解。但回顾历史，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也好，1990年代的“现代性”理论也好，也都迅速耗尽其冲击能量而成为一种常规研究套路。也许，在研究越来越“学院化”、“学科化”，越来越价值中立，思维越来越细碎化、平面化的状况下，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会有助于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当然，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历史要有更切中要害的眼光。在现代文学领域内的理论累积尚不足以产生突破性理解的状况下，要真正摒弃庸俗社会学、虚无主义，防止思维细碎化、平面化，重新学习、吸收和启用历史唯物论也可能是明智之举。当然，这不等于重操政治性的一元化独断，理解文学史的途径是多样的，这并不排斥其他解释框架。关键是保持对现实状况的敏感和批判精神，强调研究的史识与思想力，而并非重归本质论。任何趋归本质论的解释都可能稀释历史的丰富性。文学史的

阐释不可能一次终结，而是不断与历史本身提供的可能性对话，彼此相碰撞、穿越与融合。现代文学研究应当是具有历史品质的研究，它的前行途中总有不断的对话与反复的阐释。

二、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问题

面对挑战，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调整步伐，转换文学史观念与研究的方法、理论、框架。早些年就有人说现代文学是“拥挤的”学科，部分学者已经率先“出走”，“转行”做其他领域的研究。有些人可能认为现代文学毕竟时段短，学术含量不大，很难做出什么名堂。其实学术含量大小并不取决于时段长短。现代文学作为千古难逢的“大变局”时段发生的文学，其独特性和丰富性还远未能被较充分的发掘和认识，何况作为一种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新传统”，不断会有许多题目等待探究。不妨从另一角度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拥挤”，也可能是因为思路狭窄，还有很多空间未曾开发。思路打开，文学史观以及进入研究的理路、方法与框架都会有所调整，研究的空间往往也就陡然开启了。

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学者，特别是老一辈学者，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潜在危机与挑战，都在尝试一些新的理解、回应模式。严家炎提出“文学生态”问题，从文学生态的角度重新考虑文学史，将以往强调主流、支流、逆流的结构观念调整为多元共生、平等对待的结构模式。杨义提出“重绘文学地图”，力图以“大文学史”统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甚至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范伯群提出“双翼论”，认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构成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应平等对待，缺一不可。陈思和提出“先锋与常态”，用来把握文学写作的内在发展规律。吴福辉指出有五种新出现的文学写作模式，并倾向于用“合力型”文学史，去反拨过去的“主流型”文学史写作。我很注意吴福辉关于当下研究态势的说法。他认为到现在为止，“分解的尽头还没有到，新的大归纳正在酝酿当中，小的归纳已经不断出现。从这些小的归纳里面可以看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了。”^⑧看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已纷纷嗅出学科变迁的某些气息，这些“小归纳”的积累也许正在预示现代文学研究处在一个新变动

的前夜。

我们看到了种种学科“突围”的方案，大多是为了挽救文学史写作的困境，大家这些年谈论较多的，是文学“通史”写作如何应对现代文学“边界”的不断扩大，以及价值取向日益多元而又有些混乱的问题。因此，陈思和并不认可现代文学学科“已经成熟”，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有意标示为《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不过他也不否认现代文学学科“其内涵的日益丰富与理论外壳的不相容性又一次到了需要大调整的时机”^⑨。诸如“现代旧体诗词的发掘研究”和“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都给本学科的学者“又一次提出了艰巨的任务：我们当然要维护自己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的生存理由，要维护‘五四’新文学精神在本学科所拥有的核心地位，但也不能回避，‘现代中国文学’，确实包含了许多非‘中国现代文学’所能够容忍的文学因素，要承认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从新文学史的观念演变而来，比较狭隘的新旧对立思维模式再加上战争文化心理构成的思维模式，建构起来一套所谓主流、支流、逆流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不能适应今天学者们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本学科所取得的学术发展”。而要将雅俗、新旧并存的文学现象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史，并不是靠简单的拼接就可以大功告成的。陈思和在苦苦思索，能否以“先锋”和“常态”两种形态的并存与流变，作为考察20世纪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⑩。虽然从这个框架里可以看到周作人式的“循环论”^⑪的某些启发，这对宏观把握文学思潮的演变，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尝试。但问题仍未能解决，那就是雅俗、新旧并存的背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价值评判。

这些年大家谈论很多的“通俗文学”如何“入史”，其实和学科的“边界”调整以及评价尺度问题密切相关。

现在即使立场再“守成”，也不会有人再否认“通俗文学”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通俗文学”等“非新文学”能否纳入现代文学史版图，已经没有什么大争论，关键是如何操作，是拿出“货色”来。“通俗文学”到底如何“入史”，如何避免单纯的并置、拼接或拔高，仍然是尚待探索的难题。“难”就“难”在进行这种“扩容”的研究，前提是要建立新的文学史观以及相应的新的价值评价体系。朱德发敏感地意识到这个